

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 理念突破、脉络演进与体制再构

□ 朱 荟 陆杰华

[摘要]立足中国老龄化新国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既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无疑与贯穿人口老龄化新形态、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下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强国方略下人口发展目标战略选择和多元共同体共识的理念突破高度相关。一方面,从行动到战略的脉络演进的历史层面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既是人口公共政策体系拓展、升华与完善的浓缩和写照,也是国家治理水平日趋现代化的现实样本;另一方面,从行动到战略的体制再构的实践层面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无论从战略定位、战略内涵上,还是从战略支撑、战略体系上,均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样貌、理论形态和逻辑体系。

[关键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理念突破;脉络演进;体制再构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21)02-0012-07

[作者简介]朱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引言

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与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①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历次党的全会文献中第一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层面的最高级别的重大战略部署。^②毋庸置疑,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事关统筹“两个大局”,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开创且深远的意义。

新国情催生新行动,新行动提出新要求,新要求塑造新战略。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还是从计划经济初期的农村五保老人保障工作到改革开放深化时期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宏伟布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从专项行动到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既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公共治理顶层设计与共和国共成长共命运,跻身为国家战略体系的历史总结,也是人口老龄化学术成果在借鉴与创新中回答新时代我国处于怎样的人口与发展的重要节点和应怎样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的理论结晶;同时还是人口老龄化战略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升华,是开辟中国之治

收稿日期:2021-03-01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A32)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内涵、测量维度与政策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CRK013)阶段性成果。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新境界、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前瞻性新战略。因此,应深刻理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精髓要义,按照历史与未来相贯通、理论与现实相融会、顺应大势与激流勇进相结合的全方位视角对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深入探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念突破、脉络演进与体制再构。

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念突破

从行动到战略,从新国情到新国策,从专项政策到举国方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历经重大历史性转变,这既是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一项战略思想和总政策。^④多重理念的突破与创新共同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思想基础的宏大转变。

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国情理念是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从行动到战略的本体观根基。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来势汹汹且迅猛发展已成为共识。2000年我国以10.5%(60岁+)和7%(65岁+)的老年人口指标初显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到2010年这两个数值分别达到13.3%(60岁+)和8.9%(65岁+),而到2019年末则激增为18.1%(60岁+)和12.6%(65岁+),其中60岁以上人口规模达到2.54亿人。^⑤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全新且难以逆转的人口和社会形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贯穿我国21世纪的新国情。^⑥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将达到3亿,占总人口的1/5;到2033年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的1/4左右;而到2050年前后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1/3,老年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比例双双达到峰值。^⑦由此可见,自21世纪初我国步入老龄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在不断地加深,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仅仅用了不到20年,从中度跃入重度仍在快速加剧。老龄社会新国情下的国家治理范式及其制度安排的改革,可持续发展及其新动力的深挖,代际共享机制及对新社会风险的研判等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也是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与伟大复兴的重大议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问题的认识理念是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从行动到战略的认识观根基。人口老龄化问题本质上不仅是人口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老龄问题也不仅是老年人问题,其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⑧老龄化的严峻且深远的影响存在于人口均衡和人口经济社会协调的方方面面,如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养老保障与保险的可持续、家庭规模与家庭功能、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潜力、涉老服务与银发产业等等。有学者认为,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着眼点,都可以统一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战略框架之中。^⑨战略统筹决定全局成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前瞻的战略智慧站在战略高度上系统回答如何化解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如何通过将人口领域政策与相关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如何挖掘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国家发展活力与动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优势推进社会进步与续写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从行动到战略的价值观根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一期间,我国人口态势正在经历老龄化加剧的历程,人口动能的结构性转变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年均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优势式微等等。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不仅有赖于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等目标,更应在深层次上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突破人口发展瓶颈,促进人口红利转型且延续。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应运而生,这一极富创见的战略远见既是兴国兴邦的举旗定向,也是中国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助推引擎,更是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之路。按照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2020年到2035年的第一阶段,逐渐实现人口发展从数量压力到结构性挑战的历史性转变,

解决人口发展区域不平衡、服务保障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以人口素质优势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从 2035 年到 2050 年的第二阶段,进一步增强人口与经济社会双向适应能力,实现人口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均衡,保持世界强国人口态势的走稳走好。^⑩

多元主体共享共建的共同体理念是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从行动到战略的治理观根基。一是从国际与国内来看,一个政策能否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需要具备的首要特性是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⑪近 30 年来,历届联合国大会都将老龄化问题作为重要议程,呼吁各国政策重视且制定综合型的国家战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人口大国,适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动力。二是从国家与个人层面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从行动到战略,不仅是预判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满足老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更是培育老龄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推进老龄社会包容普惠共享、厚植老龄社会的中国文化、推进老龄社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三是从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角度上看,从认识老龄化、宣传老龄化、解决老龄化到应对老龄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推进与实践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自身在内的各方面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⑫

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脉络演进

众所周知,老龄问题包括老年人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前者是一个特定群体的需求和权利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关乎全人口全社会全生命周期的系统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建设性和开创性的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是狭义的、专项的和特指的,而是广义的、统筹的和泛指的,其施政目标不仅在于促进老年人在老年期的身心健康和权益保障,更在于消除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减低其引发的潜在风险,同时尽可能努力激发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活力。纵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形成的脉络演进,它既是人口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与

升华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日趋现代化的现实样本。

第一阶段(1949—1977):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化的孕育奠基。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站起来”之后的近 30 年间,国家的人口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种生产”的生育节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系列讲话、批示和报告中提及“有计划的生育子女”的思想,由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控制人口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主旋律。这一阶段老龄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前瞻虽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宪法基础、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化思路初见端倪。1954 年 9 月,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三条明确指出: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以宪法为基础,相关政策法规围绕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内容进行基础型的规定。^⑬如 1951 年 2 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对退休年龄、养老待遇,以及兴办养老院、休养所、疗养所等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等内容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此后,国务院在 1955 年 12 月和 1957 年 11 月相继出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与颁发的这些涉老制度性文件既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体系的奠基,也为新中国在短期内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公有制单位模式下的退休保障提供了制度支撑。这一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虽尚未形成独立形态,但具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我国广义人口政策的开篇布局奠定了历史基调。

第二阶段(1978—1999):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化的悄然萌发。第二阶段既是从改革开放到我国步入老龄社会的一个历史过渡时期,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延续探索,逐渐形成法制化与体系化的重要时期。^⑭从 1978 年起国家相继对工人退休和辞职、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等政策条例修订完善,到 1979 年《刑法》和 1980 年《婚姻法》对

赡养父母和禁止虐待老人的刑事和民事规定,再到1982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并参加同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会,以及1994年原国家计委、民政部和劳动部等10部委共同颁布的《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1994—2000)》,直至1996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第一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专项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至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层面各项制度建设正式起步,从理论思想、政策法律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做好了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初期准备,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工作体系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在制度化推进上着重顶层设计层面的发力,以首部立法和成立全国老龄委取得了重大飞越。这一时期是国家体制转型和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我国人口政策体系的重心仍集中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放松,并伴随着激发人口红利要素与人口迁移流动的服务管理等多项重大任务。这一阶段国家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在国家人口战略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且从中央到地方的细化制度并不明晰,从理论到实践上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仍有待深化。

第三阶段(2000—2019):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化的拓展深化。21世纪是国家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交织的百年征程。自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这一前所未有的新国情,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的新常态,国家高屋建瓴,积极谋划,出台了一系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方针,推出了一系列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规划的重大举措,推进了养老服务、社会保障、生育政策、就业政策、环境支撑和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重大工程。^⑥这一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化的拓展与深化最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策红利,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纲要》对老龄事业作出的制度安排,标志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路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二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重新修订及相应的地方性法规的颁布,体现了涉老法治建设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三是养老服务、医养结合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几百项老龄相关公共政策密集出台,为我国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扎实的政策支撑。四是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的城乡全覆盖在补齐农村短板的过程中,显著提高了全体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五是全国老龄委、国家卫健委、民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在老龄健康、养老服务、政策规制等方面的部制改革和职责分工,破解了老龄工作职能交叉和政出多门的体制困局,进一步完善了人口老龄化战略的行政运行机制。

这一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制度化重在行动上,这种制度变迁从局部转为全面,从突变转为渐进,从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体系迎来了大发展的新时代。即便如此,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仍是影响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决胜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和主要风险。事实上,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危机不应局限于老年人问题或者老年期问题,老龄化的根本挑战是多元的、开放的、全域的。这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战略部署还将深化,从老龄行动到国家战略的转向才能触动这一领域改革的最深层次。

第四阶段(2020之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化的自信引领。2020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四五”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进行政策部署,并明确指出具体的战略事项,主要包括: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培育养老新业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政策目标下锚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历史新方位,从此开启了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自信引领国家战略的伟大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多年,我国始终面临极为复杂且严峻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形势,从解决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速,再到劳动力资源加速萎缩中的人口红利下行,直至如今不容乐观的生育率低迷背景下养老、医疗和照料的社会福利等多重的持续挑战。如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始终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人口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篇“大文章”历经人口理念在理论上的丰富与深化,人口发展在现实中的提炼与总结,人口政策在实践中的构建与完善,成为国家战略体系中贯穿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体制再构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破土而出,肩负起新时代国家人口战略治理的历史使命,顺应着中国国情国力变化大势和统筹“两个大局”,孕育于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红利逐渐下行、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城乡倒置且不均衡、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并存及老龄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等诸多老龄社会的新特点与新形势。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体制再构上不能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应秉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国家战略的独特结构,形成从行动到战略的技术路线与现实路径。

从战略定位上看,探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体制再构必须纳入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发展格局的宏大背景之中。新发展阶段的责任担当、新发展理念的价值追求和新发展格局的高度自觉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部署的总体定位。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两个大局”下的重要机遇期,恰是国家人口老龄化更加严峻与复杂的战略风险期。从现在起到 2036 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水平将分别从 2.68 亿增至 4.23 亿,从

18.5%升到 29.1%,这将是我国应对老龄化最艰难的时期;到 2053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4.87 亿(老年人口比例约为 34.8%)的峰值^⑥,社会抚养负担也将升到最大值,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此后直到 2100 年,老年人口增长期结束,老年人口比例将始终维持在 1/3 左右,中国将长期处于重度老龄社会的稳态结构。“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则是在这样一个深刻变化的新发展格局中提出和构建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这也相应地给实践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例如,将体制再构的实践基点定位于描绘我国老龄社会的新形态、新挑战和新图景,激醒老龄社会的正向能量;定位于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根本性转变,全面激涌高质量发展的源泉;定位于完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激发老龄社会的生产活力;定位于改革优化福利和保障制度,有利激活老龄社会的有效需求。

从战略内涵上看,探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体制再构必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和主要方法中去挖掘。《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曾这样精辟地描述人口与国力的关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口来创造和利用国家力量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国家。但在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也可能对国家力量产生极端负面的影响……它们只好把本可用来发展国力的稀缺资源用作解决温饱问题。它们的人口固然众多,却非但不是发展国家力量的财富,反而变为了发展的障碍。”^⑦中国的人口治理历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决定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现实体制颇具中国样式: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是基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治理方案,是以国家权威协调地方政府和社会协同的治理活力。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治理实践将成为国家治理框架下的目标重置、主体重塑和过程重构的发展升华。

从战略思维上看,探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体制再构必须对西方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命题、指标、方法、观点、模式和范畴进行互鉴、反思

与超越。以理论指导实践,构建一套真正概括和反映中国人口老龄化道路的理论图谱和知识体系,不仅是一种学术使命,更是战略要求。如果说人口老龄化是学理分析人口结构老化的一种概念工具,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则是我国学术界对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20 多年相关理论的创新概括。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概括并不是简单移植历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理念翻版,更是有别于几个曾经流行的老龄化理念,如有保障的老龄化、安全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独立老龄化、有尊严的老龄化、有贡献的老龄化、丰富多彩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等判断。有学者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是积极老龄化中国化的创新版和升级版,也是从中国应对“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未康先老”等老龄社会新国情多重挑战的中国战略选择。^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彰显了以人口老龄化学术研究为基点开展国家战略的理论自信,以学术话语为战略方法的主导,在某种意义上说,扭转了老龄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维度。

从战略支撑上看,探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体制再构既要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战略说明挖掘其间蕴含的战略议题,又必须超前谋划战略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以人力资源开发与银发经济兴起、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体系制度设计、生育政策完善与人口均衡发展三个核心议题构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制再构的主体支撑。第一个支撑着眼于经济体制再构,从经济发展新动能视角下支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践,主要是从老年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发展探究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包括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及其优化配置、银发经济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以及新发展格局下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等等。第二个支撑侧重社会体制改革,包容共享普惠视角下支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践,这一部分是从代际间利益分配和老年社会参与两种机制路径探讨代际共享新机制,如后小康社会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制度设计、健康中国与老龄健康、城乡老龄化倒置及其应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和老年群体治理路径等。第三个支撑是从文化体制的人口均衡发展视角下支撑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实践,着眼点是关注人口发展特征及其走向,优化生育政策和构建生育支持友好政策体系,完善人口内部动力的体制机制。此外,相关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等深化改革也是呼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制再构的题中之义,比如紧紧围绕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组织领导、机构设置、管理规范等新内容和新蓝图都应有转变职能与优化结构的统筹推进。

从战略体系上说,探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体制再构必须回到国家战略体系整体集合中谋求实践合力。在继承和优化已有国家战略实践方向的基础上,在更深层次和更大广度下相互影响、对话和融合,催生领域有别却同方向、层次分明且同目标的国家战略实践组合。新时代国家围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先后构建了质量强国、制造强国、区域协调发展等经济强国战略集,科教兴国和知识产权等文化强国战略集,就业优先、食品安全和全民健身等社会强国战略集,可持续发展、主体功能区和能源发展等生态强国战略,以及海洋强国、军民融合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等安全强国战略。^⑪未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将作为人口强国战略集合,协同人才强国、健康中国和人口发展等综合性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以强国战略总集的形式确保人口贡献、经济贡献、文化贡献、社会贡献和生态贡献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配合,所有领域的国家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整体性重大战略布局,共同引领国家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结语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从理念到行动再到战略的转变,并不是对欧美或日韩等国家人口老龄化国家发展战略的简单翻版,而是来自老龄社会新形态、人口老龄化的本质属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国际与国内、国家与个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体共识的多重理念突破,充分显示国家人口老龄化整体应对在理念创新和制度实践的伟大成就。当然,从脉络演进与体制再构的双重维度中视角审视和谋划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历史路径与

实践路径,既是以人口老龄化行动为线,勾勒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战略积淀、发展和变革的秩序谱系,更是以国家战略的定位、内涵、方法、支撑与体系构筑新时代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制机制的创新布局。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立足老龄化新国情,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既延续了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国际共识,更是旨在探索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案。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将全域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下的世代福祉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执政党的政治优势,将中央权威的治理能力协同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治理活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营造有利战略格局,确保全体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健康、更具尊严、更为幸福,确保老龄化不断加深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具韧性、更富活力、更有可持续性,确保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人类老龄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⑳

注释:

- ①⑱王洪川、胡鞍钢. 国家战略治理演变特征、运动方向及逻辑[J]. 学术界, 2020(8).
- ②李纪恒.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N]. 光明日报, 2020- 12- 17.
- ③陆杰华、郭冉. 从新国情到新国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考[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5).
- ④⑲邬沧萍.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诠释[J]. 老龄科学研究, 2013 (1).

- ⑤人口总量增速放缓 城镇化水平继续提升[EB/ OL].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1/t20200119_1723861.html.
- ⑥胡湛、彭希哲.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2).
- ⑦到2050年老年人将占我国总人口约三分之一[EB/ OL]. 中国政府官方网站, http://www.gov.cn/xinwen/2018-07/19/content_5307839.htm.
- ⑧原新.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J]. 人口研究, 2018(3).
- ⑨蔡昉. 即将迎来人口峰值与快速老龄化叠加阶段, 要提前做好战略准备[J]. 瞭望, 2020(51).
- ⑩杜鹏、李龙. 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1(1).
- ⑪李志宏. “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式及国家战略对策[J]. 老龄科学研究, 2020(8).
- ⑫吴玉韶.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尽快形成“六个共识”[N]. 中国社会报, 2020- 11- 26.
- ⑬陈功等. 中国老龄政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4(4).
- ⑭陆杰华、汤澄. 公平视域下的中国老龄政策体系探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5(1).
- ⑮陆杰华. 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顶层设计的主要思想及其战略构想[J]. 人口研究, 2018(1).
- ⑯总报告起草组.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J]. 老龄科学研究, 2015(3).
- ⑰[美]汉斯·摩根索著, 徐昕等译.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62- 165.
- ⑳李志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特色道路的基本内涵和总体布局[J]. 老龄科学研究, 2020(7).

责任编辑: 陈艳华